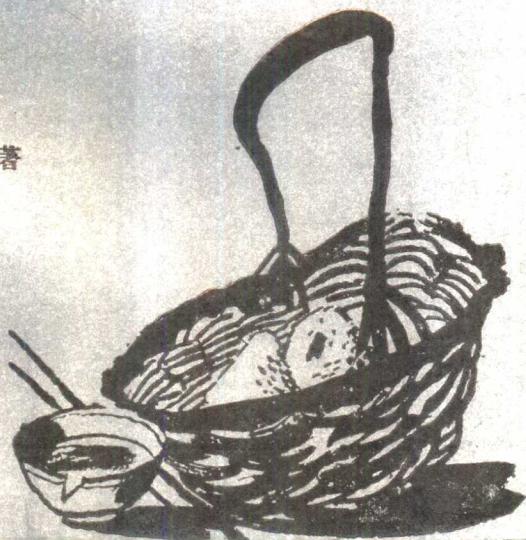


灾荒与饥馑 1840-1919



李文海 周源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
工作委员会重点规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国情丛书》

灾荒与饥谨

1840—1919

李文海 周 源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112 号

中国近现代国情丛书

灾荒与饥饉

1840—1949

李文海 周源著

*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20 000

1991 年10月第1版 1991 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 550

ISBN7-04-002632-5/G·215

定价 5.60 元

中国近现代国情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周 林 戴 逸

主 编 夏自强

副主编 王汝丰 龚书铎 田珏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 渊、王汝丰、王茂根、

王晓秋、安平秋、田珏、

刘桂生、夏自强、

龚书铎、彭 明

秘 书 王宏凯

致 读 者

《中国近现代国情丛书》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各方面的关怀、鼓励和支持下，将陆续出版问世了。

邓小平同志曾经语重心长地指出：“要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教育时也指出：“我想特别提出国情教育的问题，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经济文化发展现状的教育，经济资源和人口问题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等等。”

通过学习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使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比较全面地认识我国的国情，知道先辈们是经历了怎样艰难曲折而又光荣伟大的历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祖国，这对于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是很有必要，很有益处的。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国情丛书的目的。

早在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认清中国的国情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探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最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认识到的。农民没有认清，小

资产阶级没有认清，民族资产阶级没有认清，许许多多的“学问家”也没有认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切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为什么行不通，乃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措施，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毛泽东同志郑重地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他一再反复强调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性：“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又说：“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时隔五十多年，情况固然有了很大变化，然而今天看来，岂不仍有很大的针对性。对那些一心追求全盘西化，说着热昏胡话的人，岂不是一副绝好的清凉剂。

指导中国革命必须加强国情教育，指导中国建设同样必须加强国情教育。对青年进行教育也同样必须加强国情教育。因此，江泽民同志说：“广大青年拥护改革开放，但是他们中不少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也就不可能了解改革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幻想在一夜之间把西方的物质文

明搬到中国土地上，比较容易接受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帮助青年懂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崇高理想又能脚踏实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很重要的。如果能够对这些有所帮助，这就是我们诚挚的心愿。

什么是国情？就是国家的实际状况。《丛书》将本着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的方针，突出选题及其内容的针对性，选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关心和较少了解，或不了解的问题，邀请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承担编撰工作，以专题研究成果的形式呈献于读者。《丛书》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丰富多采的史实，阐明中国近现代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情况，包括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榨下所遭受的苦难和屈辱，中华民族先行者追求真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曲折过程和最终选择；中国人民气壮山河的英勇斗争和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以及中国近现代的人口、资源、灾荒、租界、吏制、民风、思想、文化等诸多内容。一题一书，各自独立，各有特色，而各书之间又有其内在的联系，构成《丛书》总的序列。希望通过这一系列专题，使读者对我国近现代历史和国情能够获得比较系统、比较全面的了解，有助于回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要求《丛书》具有科学性。努力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确凿的史实和丰富的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经过科学的研究，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讲出道理。不少作者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努力发掘新材料，详尽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力求做到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只有全面地科学地阐述了历史的真相和本质，才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丛书》不只呈献给大专院校的青年朋友，而且还面向社会各界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朋友。我们力求把科学性与可读性，针对性结合起来。历史本身具有极大的生动性，通过大量的丰富的人和事的情节描述，引起读者的共鸣。要求《丛书》深入浅出，活泼生动，明白易懂，富于趣味，引人入胜，得出应有的结论。

我们深知，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当努力去做。

《丛书》的编辑工作得到国家教委和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许多高校党政领导同志对《丛书》工作给予深切的关注和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吉林大学等校领导同志，或为《丛书》组稿、或为编辑出版提出建议，或带头承担选题，为《丛书》撰稿。很多高校的有关系、所室的教师，在《丛书》开始酝酿时起，一直关心《丛书》的工作，纷纷来信来访，主动接受选题，或提出新的选题，或提出各种

建议，深情厚意，令人难忘。高等教育出版社不仅承担了《丛书》的出版，而且直接参与了编委会的工作，所有这些都说明，《丛书》的出版，是适应客观要求的产物，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丛书》在定题、编辑及作者选择上，既注意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又特别注意中青年作者的培养。希望在数年之后，不仅能看到系列丛书的出版，也能看到一支中青年学者队伍的成长。

《丛书》编委会人数不多，能力有限。感谢各方面给予的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广大读者的支持。竭诚希望随时给予指导、批评、帮助。使《丛书》在出版过程中，不断改进，克服缺点，减少错误。

中国近现代国情丛书编委会

1990年7月

序

李 侃

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充满了屈辱与苦难，奋斗与抗争，变革与革命，失败与胜利的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在火与铁的考验中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历史。每当人们回顾以往这段历史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地为饱经忧患的祖国而痛愤，为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斗争而自豪。

中国人在遭受苦难的时候，经常把“天灾”与“人祸”联系在一起。近代中国最大最深的“人祸”，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盘剥。对这个近代历史的主题，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写出了多种多样的著作，今后也一定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著作。然而对于“天灾”，却没有引起历史学家们应有的注意，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关于近代灾荒史的专门著作出版。李文海等同志专门叙述中国近代灾荒历史的《灾荒与饥谨：1840—1919》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开拓性的历史新著，不仅充实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内容，加强了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也填补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空白。

“天灾”与“人祸”，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看，两者似乎是不同的东西，然而又往往是和经常是互为因果，交相而至的东西。所谓“天灾”，既是

自然现象，又表现为社会现象。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社会矛盾的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以及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土地关系和人口的阶级构成等等，都与灾荒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不了解和不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就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就不能真正认识中国的国情。

“天灾”作为一种自然灾害，看起来似乎是不分贫富，不论贵贱，一经发生，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都蒙受其害。然而在阶级社会里，直接地受害最深最重的仍然是劳动人民，特别是广大贫苦农民。包括近代在内史不绝书的水、旱、蝗等灾害发生之后的“悉成泽国”、“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饿殍载途”种种悲惨图景，基本上都讲的是农村和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古代和近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基本生产者，又是“天灾”和“人祸”深重苦难的直接承受者。在广大农民还不可能从阶级的剥削和阶级的对立中认识自己、发现自己，从而具有阶级的自觉的年代，在还不可能用科学的观点认识自然灾害发生原因的年代，在更没有力量去抵御和战胜自然灾害的年代，他们最直接最美好的愿望，就是渴望有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安居乐业”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这些朴实而美好的愿望，其实不过是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顶多也不过是希望得到温饱而已。然而严酷的现实却是地主阶级敲骨吸髓的剥削、残酷无情的压迫，到了近代，又加上资本帝国主义无止境的掠夺

和榨取，腐败的清政府已经步步沦为侵略者的附庸，进而成为“洋人的朝廷”。老大的中华帝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亡国灭种的危殆边缘。“人祸”加剧“天灾”，“天灾”加剧“人祸”。在天灾人祸，交相煎迫；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险恶风云中，中华民族还有生存发展，独立自主，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余地吗！中国人民还有站立起来，扬眉吐气的一日吗？历史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能！为什么能？因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不甘屈服的民族和人民；因为中国人民在百年的苦难，百年的苦斗，百年的追求，百年的试验中，历史地选择了唯一能够救中国，唯一能够发展中国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选定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用一百多年的时间，用无数的生命和鲜血，最后推倒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沿着历史必然的道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开始新的万里长征的路上，尽管我们还必须肩负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遇到这样那样的困苦与挫折，但是我们必须也能够排除万难，奋勇前进！任何具有民族良知的中国人，任何有志气的炎黄子孙，只要对近代中国百年来“天灾人祸”的肆虐，对百年来历史命运和历史行程有所了解，有所认识，那么就没有理由因为目前中国的贫穷落后而自馁、自卑、自弃，因为我们的先人，已经在那样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中，在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灾荒饥谨、水深火热中，终于把我们这个民族和人民从濒临灭亡的危难中拯救出来，难道走上社会主

义光明大道的后来者，就不能踏着先烈们的足迹，完成他们的未竟之业，开辟新的未来吗！历史和现实已经和正在作出肯定的回答：能！谓予不信，请读一读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史，请读一读这本《灾荒与饥谨：1840—1919》！

“天灾”或曰自然灾害，确实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决定，也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完全防止的自然现象，即使是科学技术发达到如此高度的今天，对某些自然灾害也还是只能做到一定程度的预防，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而不可能完全杜绝和“制止”。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抵御自然灾害、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毕竟是大大增强了。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巩固，虽然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上还不够发达，但是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在防御和战胜自然灾害方面，已经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当今中国为什么可以用占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全世界22%的庞大人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什么从解放前的34岁增加到现在的69岁；在近代平均每两年漫决一次的黄河为什么建国以来岁岁安澜，许多恶性传染病为什么得到了预防和消灭？所有这些，都是人民政府依靠人民群众大力防灾救灾、治江治河、兴修水利、抗旱防涝、防疫治虫、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等措施的结果。再以人们普遍关心的中国人口问题来说，从1953年到1989年36年间，全国人口从不到6亿猛增到11亿，人口的暴满，已经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甚至对民族的

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以致非实行严格的控制和计划生育不可。而反观历史，据专家们研究统计，中国人口从1350年的4.3亿到1953年的5.8亿，一百多年的时间，人口只增加了1.5亿，可谓是相当低的平均增长率。这里抛开建国以后在人口问题上的严重失误不说，从另一个历史角度看，如果不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在整个民族的生存都难以保证的条件下，在战争、灾荒、饥谨、疫病连续不断地夺取人民财产的情况下，人口增长的缓慢，正是说明“天灾”与“人祸”对整个民族的摧残与扼杀。

《灾荒与饥谨：1840—1919》的作者李文海等同志，是以真挚的爱国热忱、饱含对百年民族苦难的悲怆，以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冷静、科学的态度，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和近代社会；以历史的使命感和时代的责任感，撰写了第一本中国近代灾荒简史。我无意对此书和它的作者们做“礼貌”式的恭维和赞扬，更无力对此书做恰如其分的估价和评论。只是凭着一点对真诚关心祖国和人民历史命运的史学同行的尊重和感激，在这里表示我的一点微薄的心意。历史和现实，时时使我痛切地感到，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何等艰巨而意义深远！在这国际政治风云急剧变幻，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迎面扑来，五花八门的“理论”接踵而至，历史面貌被弄得扑朔迷离的时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怎样才能站稳自己的脚根，清醒而严肃地对待

历史和现实，已经成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回答的问题。《灾荒与饥谨：1840—1919》用自己的实践，从一个侧面，一个过去曾被忽视的历史领域，正视和回答了这个问题。而这也正是我对此书及其作者表示尊敬和感激的原因所在。

上面说了一些似乎与此书既有关又无关的话，说对说错并不重要，因为此书的价值和意义自会经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并不会因为我的这无足轻重的议论而改变的。是为序。

1990年5月1日

序

彭 明

《国情丛书》计划第一批出书八本，《灾荒与饥馑：1840—1919》（以下简称《灾荒与饥馑》）是最早交稿的一本。作者李文海教授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党政事务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但他还是抽出晚间的业余时间写作，按期完成了这本专著。编委会同人对他这种孜孜不倦、刻苦治学的精神非常感佩。所以，当作者嘱为此书作序的时候，我也就欣然同意了。

我愿为此书作序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家乡（豫东夏邑）是历史上的重灾区，象书中所引“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那种安徽凤阳花鼓调，我在童年也会唱的。根据记忆，每届春荒，家乡出走乞讨者不绝如缕。就在前不久，我在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时，还看到了这样一件档案材料：“豫东夏邑灾情甚重，全县民众十分之七以上逃往各地，境内青苗树皮均被食尽。”（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各省水灾调查报告，1948年，存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这里讲的虽然是1948年，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看了《灾荒与饥馑》一书，就不难从历史上找到原因。

作者曾参加70余万字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的编写（最近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

版)。《纪年》依据清宫档案、官方文书、文集、笔记、书信、日记、地方志及报纸、杂志等，资料相当丰富。《灾荒与饥谨》一书就是在《纪年》的基础上写成的。因此，我感到资料的翔实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材料丰富，但又不能简单地罗列，因为本书是一本专著，所以它的理论分析也是较强的。正如作者所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说：“自然界作用于人”，“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本书不仅有专节论述“人祸加深了天灾”（第一章第二节），而且全书也都贯串着天灾与人祸的密切关系。河南人在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有一句口头语：“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它很形象地反映了两者的关系。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是本书的又一个特点。

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是《丛书》体例一再要求的。我看本书是注意到了这一点的。全书的开篇在“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标题下引了老舍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的一段生动描写，把旧中国的水、旱、灾荒景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再如1887年黄河在郑州决口时的那段描写，数万民夫对“克扣侵渔，以致堤薄料缺”而导致河决的一位官员切齿痛恨，将其痛打之后，“支解投河”以泄民愤（第一章第二节），读来也是很感人的。文字通畅，事例感人，我觉得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近年来，史学界常有“史学危机”或“历史无用”等说法。我虽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但有些现象却还